

作品质量是一切的根本

作家、出版人、学者谈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儿童文学发展

□本报记者 刘秀娟

二十一世纪进入到了第二个十年,儿童文学界的人士们在认真梳理既往成绩的基础上,为儿童文学问诊把脉,并对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思考。

作家:安静,再安静些

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作家成了出版市场的“宠儿”,从卓有成就的名家到富有潜力的新人,都是各出版社争抢的资源。面对市场的“大好形势”,不少儿童文学作家却一致发出了冷静的声音,安静、耐心、创新、担当、难度等成为他们思考的关键词。

在秦文君看来,原创儿童文学好像处在变浅变轻的风潮里,真材实料分量过轻,水分多。作家之间缺少足够的差异,“面孔”差不多,疑似“近亲”。儿童文学迫切需要有更多灵活的写法,有创新的样式,有朝阳一般的新的激情,有奇特的想象力。“过去没有市场,儿童文学是遗憾的,如果只有市场,儿童文学是破碎的,将会更遗憾。如今是出好作品的最佳时刻,如果没有足够的好书,儿童文学的繁荣不能长久。中国儿童文学要有不断超越自己的极佳状态、极好的创作势头,建立雄厚的创造功力和实力。”

梅子涵说,他从处女作发表到第一部单行本出版,历时19年。这种艰难、缓慢、挑剔非但不是人生的遗憾,却是宝贵的财富。“我感谢那个年代给了我文学崇高感,感谢那个年代‘作家’两个字是持重的、诗意的,让我懂得文学创作就是含有要为文学提供新的艺术、新的面貌的意思。一个真正写作文学的人,应该是一个文学的艺术提供人、增添人。我们应当羞于把很多随随便便的文字拿来当儿童文学。”他希望当前的儿童文学能够更精致、更风趣、更干净,而作家们不要写得太快。

“如何更好地展示这个时代,追寻儿童成长的轨迹,把儿童小说得更有艺术分量,更有生活张力,更有人性深度,让儿童文学走向大气,拓展出更多的深度和宽度,这是我们每个儿童文学作家都应该自觉承担的使命和道义。”黄蓓佳认为,达成这样的目的是非常有难度的艺术创造。作品不能过于简单,可是又不能过于复杂;既不能让孩子快乐无边,又不能让他们对生活对世界过早地失望,陷入恐怖,要求取一个最合适的“度”。她深有感触地说:“我自己及成年人文学和儿童文学的两种写作,深感为儿童写作的不容易,在题材选择的范围上,在文字的可操作性上,在思想性和可读性的取舍上,儿童写作要更加用心,更加考验我们的智慧和水平。”

汤汤从2003年才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很快,她的创作潜力便被众多出版社看好,约稿纷纷而来。出书、获奖

对刚刚踏入文学领域的她自然是非常大的“诱惑”。但是最终,她选择了“以缓慢的方式写作”。汤汤说,现在向我约稿的出版社和编辑多起来了,可是我一般都是婉拒的。婉拒不是因为我有什么架子,是我自己写得太慢。拒绝了才不会焦虑,才不会浮躁,才能安静地慢慢地写。以后的日子里,我照样还是慢慢写,平平静静地过最简单而快乐的生活,对童话怀着足够的敬畏。

数字阅读成趋势

儿童文学界普遍认为,孩子们转向数字媒介的速度比预想得更快,数字化的扩展速度超出我们的想象。

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介绍说:根据CNNIC《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4.2亿网民中,6至19岁网民占全体网民的31%,5至15岁中国儿童的网民规模也达到895.2万人,儿童互联网渗透率为51%,高于全体网民;美国出版商Scholastic近日发布的《2010年儿童与家庭阅读研究报告》称,60%年龄在9岁到17岁的青少年对亚马逊Kindle或者苹果iPad此类的产品非常有兴趣,其中33%的青少年表示会为了娱乐而增加电子书阅读设备的使用;ipad电子书应用程序销售量前10位中,儿童的故事图书占据了6位。他认为,使用数字触屏阅读器时,儿童的手指轻碰,就会充满感官体验,新式的图片声音结合在一起把玩的崭新游戏模式,带给孩子无穷的乐趣和广阔的游戏空间。对孩子们来说,这种将故事、图画、声音以全新模式融合在一起的产品,阅读起来充满强烈的游戏精神,具有传统的儿童文学纸介质图书显现不出来的多种元素。在他看来,“没有人可以阻挡由于数字技术的飞速进步而转移的消费行为。作为少儿出版者,我们更应该发挥自身价值,积极搞好电子书内容建设,以优质、高性价比的内容带动儿童数字化阅读”。

“我们面对的儿童,是在新媒体时代诞生的儿童,他们喜欢通过不同的媒介来获取信息,他们不再像纸媒时代成长的人那样对纸媒有区别于其他媒体的偏爱。”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崔斯平认为,目前很多传统少儿出版社对数字出版的挑战仍旧缺乏预见和“危机感”。她认为,儿童具有与新媒体天然的亲和力,他们对新媒体的适应能力、运用能力都超越他们的父辈。少儿出版界引以为荣的“文化积累”已然危机四伏,那些缺少内容资源的网络公司正在以“圈地”的方式,积极与作家签约,获取未来的内容资源,那种对于少儿出版的乐观估计恐怕会麻痹危机意识,并被竞争者远远甩在数字出版的转型潮中。新媒体改变了当代人的生存状况,也改变着现在及未来人群的

阅读习惯。乐观估计少儿出版数字化,或执着于让孩子们从电视、电脑、网络游戏和多媒体的阅读环境中“回归”到传统纸质阅读,在她看来都是成人的一厢情愿。

大家普遍认为,儿童文学身处数字化时代不必“焦虑”。白冰说:“数字阅读冲击的并不是阅读,而只是阅读形式。儿童作家创造的独特的高品质的艺术形象才是儿童文学生存的命脉。尽管新技术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冲击,但儿童文学的内容依旧是核心,好的故事和图画依然是最好的卖点。”曹文轩也乐观地表示:“焦虑的应该是出版社,而不是作家。无论阅读方式如何改变,作家都是内容的提供者。”

在“世界”中确认自己

近十年间,国外各类童书以一种规模上日渐庞大、时效上愈加迅捷、数量上极为密集的方式出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哈利·波特”现象以及明天出版社的“漂流瓶丛书”、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湖南少儿社的“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等为代表的大规模系列童书译介构成了国内儿童文学出版市场的一大景观。大量海外佳作的译介对于推动国内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对当代原创儿童文学的精神和艺术面貌产生着日益深刻的影响。“当我们的读者越来越熟悉来自世界各国的重要作家与作品的名字时,中国儿童文学留在域外的足迹却显得稀少而又轻薄。以2008年的‘白鸟鸦’节目为例,在该书单东亚部分的中国条目下,我们只看到了一部2007年出版的插画版《西游记》。”在学者方卫平看来,“走出去”的强烈诉求反映出中国整个社会经济和国际地位的变化,表达了积极参与国际文化的心态以及当下儿童文学的信心,是关乎中国儿童文学艺术未来的一个重要命题。

儿童文学“走出去”技术方面的瓶颈是翻译人才、翻译资金、学术交流以及政府和民间力量支持等方面的问题,但归根到底,必须深入到艺术本体的探讨上。方卫平提出,不能一味地以“走出去”的目标来规划我们的创作和出版,而要更多地把“走出去”作为一个进行自我比较和反思的契机,站在世界性的角度来考察和思索我们自己的写作。这样,“走出去”的焦虑就有可能转变成一种反观自己的勇气,而这份勇气及其实践将在真正意义上把我们的文学带向更高的海拔。

学者朱自强也认为,在整体上我们距儿童文学发达国家的水准差距还很大,进一步修炼艺术内功,是摆在每一个有志向的儿童文学作家面前的现实课题。他也提醒说:“走向世界,不能简单兜售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那只是表面文章。现在有些原创的图画书就在做表面文章。正如作品里写写吃肯德基、麦当劳,甚至西餐大餐并不就是与西方文化接轨一样,用水墨画、剪纸、年画,也并不能保证就是民族特色、中国气派。”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也表示,没有基于内容创新的原创儿童文学出版的极大繁荣,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和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都很难实现。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文艺巡演慰问海外侨胞

本报讯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春节期间举行“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文艺巡演,赴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城市慰问海外侨胞。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旨在通过对中华文化的精彩展示,丰富海外侨胞的春节文化生活,抚慰侨胞的思乡之情,同时,提高华人的良好文明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及中华文化的了解。与往年相比,今年“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去往的地区更广,包括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等,其中非洲是首次访演;演出阵容更强,集合了多个知名艺术院团和一大批知名艺术家;节目内容更加丰富,包括歌舞、器乐表演、杂技、魔术等多种艺术形式。



2月7日,“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艺术团的演员在伦敦表演《俏花旦》



2月8日,中国中央民族歌舞团演员在墨尔本表演舞蹈

西藏作家新年联谊会 在拉萨举行

本报讯 西藏作家协会和《西藏人文地理》杂志近日在拉萨联合举办西藏作家新年联谊会。

西藏文联副主席、作协常务副主席吉米平阶在致辞中代表西藏作协向全区作家致以节日问候和良好祝愿。他说,过去的一年是西藏文学界团结进步、创作繁荣的一年,西藏作协的各项工作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广大作家通过创造性劳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组织周密的各类文学活动,更是为团结作家队伍、培养文学新人、推出精品力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去年年初召开的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把西藏建设成为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的战略目标,为西藏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西藏人文地理》主编、西藏作协副主席嘉措说,西藏作家一定要按照1月18日在拉萨召开的全区文化发展大会的安排部署,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人民军队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为西藏作家走出高原、奔向全国奠定良好基础,作好充分准备。

与会作家纷纷表示,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把握时代机遇,积极深入生活,写出佳作力作,以回馈时代与生活的厚赠。

“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

——关仁山访谈

□本报记者 颜慧

长篇小说《麦河》一经出版,就引起多方关注与好评,被认为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一次成功超越。近日,记者采访了作者关仁山。

记 者:从《福镇》《天高地厚》《白纸门》到《麦河》,你的作品一直关注农村、农业、农民,关心乡村命运,注重表现几十年来农村的沧桑巨变。在创作中,你如何敏感地捕捉时代变迁中农村生活的变化?

关仁山:用小说描绘现实农村,有难度,更有挑战,因为距离太近,这不仅是时间的距离,同时也是审美的距离。可是没有办法,我喜欢接受这种冒险和挑战。现实农村的每一个变化,我都感兴趣。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农民读者来信中的一句话:“描写农民的作品,就像麦子、棒子、大米、大豆和高粱一样,不昂贵,不起眼,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普通大众最需要它。”我总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今天的文学到底还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广大农村发生的一切,众多农民的生活,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国事”。今天的调整和明天的政策,比如《天高地厚》写到的免交农业税,还有《麦河》写到的土地流转,其实都属于“事件”,是瞬息万变的现象,是历史长河中的浪花,如果不把它放在历史深层结构中去考察,我们就会被现象迷惑。所以说,我们还是应该贴近人心,体验农民的心灵,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内核”是什么。换个说法,我们尊重农民,尊重他们的尊严,除了尊重他们生活的场景,还要尊重他们生活的逻辑。今天农民心理是多层次的,历史的、文化的东西也必然沉淀到他们的心理中去,传统农民要转变成现代农民,要经过艰难漫长的路程。农村正以迟缓、渐变、多样的形式出现。就像春天的冰河,表面千里冰封,但在天河深处,坚冰在悄悄地消融,河水变得湍急。

现实生活不好表现,作家在当下生活面前碰上了很大的困难,包括认知的困难和表现形式的困难。抛开惯性写作,寻找新的空间。说到敏感与捕捉,我没有这种特殊本事,说到底,还是生活本身点燃了我的创作激情。文学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的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

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如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和土地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土地问题怎样解决?有人说,搞现代农业,应该首先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可怎样解决却众说纷纭。于是,土地流转开始了,《麦河》就写了土地流转的复杂性。于是,让我们的农民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道路。

记 者:《麦河》成功塑造了瞎子白立国、曹双羊、桃儿等一批各具特色、血肉丰满的新农民群像。你如何理解农民形象的“新”?

关仁山:文学的任务是要塑造新形象,新与旧是相对而言的。呼唤创新的时候,还不能割裂过去。在塑造曹双羊的时候,我就说过,今天的梁生宝是什么样的?我要塑造今天的梁生宝。《麦河》出版后,有些评论家说这本书最突出的文学实绩,是塑造了现代农民形象——曹双羊。曹双羊终于从为了财富打拼天下的传统农民,蜕变为一个搏击市场的现代农民。大家还认为他是一位独具思想和艺术个性的新农民形象。曹双羊的性格和胆魄是不同凡响的。他胆大、心硬、执拗,在创办企业、开拓市场、整顿管理、联盟官商等方面,常有惊人之举,不达目的绝不要休。“老虎的屁股,球儿!”是他的口头禅。他守信、仁义、重情,在处理亲人、朋友、乡民以及家庭、商界、官场等复杂关系中,表现出一种宽阔的胸怀和真诚的品格。他对农民与土地有超常的爱,但是他农民式的从商理念同商品社会灵活的游戏规则格格不入,这是他遭遇失败的深层原因。但是,他就是在痛苦的阵痛中,在失败中站立起来,革命性地完成了农民人格到商业人格的转型,从而完成当代社会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挖掘和重塑。曹双羊就是这样打拼过来的,他不算农民英雄,但他是一个有缺点的能人,是另一种新农民。

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对人、人性、人道和人的精神的认知过程,它是描写人、认知人的历史。我在



乡村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要冲破旧有的模式,就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

如瞎子白立国,我太熟悉这类人了。作为小说叙述者,乐亭大鼓是叙述者的任务,而且是完成故事叙述者的任务,也是乡村的另一种能人形象。“瞎三”白立国心地善良、富于农民式的幽默和智慧,他虽然失明,但关心着鹊鹅村的大事小情,成为全村不可或缺的公众人物。他不仅善唱乐亭大鼓,还会运用《周易》的理论为人算命占卜,可以说是民间文化的一个载体,也是民间道德的化身。他同曹双羊的碰撞和与桃儿之间的感人爱情就足以证明。桃儿是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她失过身,又由于卖淫被抓,自杀时被白立国救了。从此,她为了感恩而爱上大她15岁的白立国,并走上了自我救赎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牺牲了一批桃儿这样的女人,她们的救赎应该是一个重要问题。无论怎样无奈和忧伤,社会还是要面对她们的,应该给予她们一些温暖。

塑造新农民,我有这样的想法:面对今天农村风云际会的宏阔背景,作家应该怀着一种现代意识,从人性复杂多样的角度,来审视乡村社会所有人的行为动因。这样我们就能从新鲜的生活流里找到新意。所以,面对复杂的乡土世界、复杂的人物内心,作家还是应该宽容一些,宏大一些。

记 者:《麦河》里对当下农民的精神状态、人与土地复杂关系的准确把握及反思很吸引人,“这是一部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在这种巨大变革中,文学作品如何更好地参与到这种进程中?

关仁山:评论家陈晓明说《麦河》把悼词写成了颂歌,把颂歌写成了悼词。实际上,就中国农民与土地关系来讲,哀乐和颂歌是杂糅在一起的,听着让人感奋,听着让人落泪。土地史就是文化史和精神史。土地养育了我们,同时给了我们忧患的意识,它那经历苦难所焕发的再生、再创造的涅槃意识,足以震撼我们。同时土地也像一条河流,围绕着这条河,百年歌哭上演了,有的时候从历史与现

实的结合点上认知现实,会获得对现实的思想见解。我们看到了大河奔涌的幕后,中国农民在漫长的城市化进程中所上演的人生活剧。

现在想来,大工业越发达,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越想留住一片土、一片净土。这是一片土地的悼词,也是一首土地的颂歌!我想把人放逐在麦田里,让他们劳动、咏唱、思考,即便知道前方没有路,也不愿放弃劳动和咏唱,也不愿停止前行的脚步。今天物质狂欢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奉献了什么?我们奉献了土地。

记 者:你的主业是小说创作,而你创作的报告文学《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你认为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有什么相互借鉴之处?

关仁山:我创作过4部报告文学作品,以后会在小说和报告文学中穿插写作。尽管这样,我还算是小说为主的作家。但是,报告文学有时不被看作,其实不是对的,报告文学从社会道义和良知出发,记录变革时代令人激动的人和事,真实而客观,这也需要小说家好好学习。我非常崇敬报告文学作家。小说的写作手法,如果运用到报告文学创作上,会增强艺术感染力。

记 者:《麦河》刚荣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有专家认为你过去作品写得过于实,而《麦河》有了浪漫和空灵,是你对自身创作的成功超越。你是如何完成这种超越的?

关仁山:《天高地厚》之后我心情苦恼。表现农民的方式有许多遗憾。有人说苦闷是我们创作阶段上的否定过程。艺术上怎样出新?如何把政治话题转化成文学话题,是需要读书和思考的。雷达在评论中说,“《麦河》保持了现实主义的基调,但同时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色彩,展示出一种魔幻般的迷人气息,使这部关注土地、河流与村庄的作品具有了形而上的风格。”这是对我的鼓励,我自知还可以继续做好。但是,选择视角的自觉性,是写《麦河》才有的。小说以盲人和苍鹰的“穿越”视角叙述小说,是为了克服意识形态视域以及现实的困惑对于小说写作的制约,力求实现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思想与艺术在小说中的有机融合。我引用了中国式的魔幻,让瞎子与鬼魂对话,虚实相间,增加了历史厚度,还能节省篇幅。我还使用了民间传说、神话,这样造成浪漫氛围,让该飞翔的飞起来,看来得到了读者初步认可。

面对